

刘挽云 刻砖有魂 传承有心

■ 记者 田莹

在机器轰鸣、信息奔流的时代，依然有人选择与青砖为伴，与刻刀共舞。她就是刘挽云，在天津民间工艺领域，与“泥人张”“风筝魏”“杨柳青年画”并称“四绝”的“刻砖刘”的第五代传承人。

她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守艺人”。在她身上，古典艺术的学养与拍卖行里历练出的现代视野交织；工匠世家的执拗血脉与学院派的系统思维共振。她放弃旁人眼中的坦途，选择了一条窄路，不仅要将濒危的手艺从时光深处打捞出来，更要为它在当代生活中找到安身立命乃至蓬勃生长的土壤。在她手中，冰冷的青砖被赋予了温度、呼吸与灵魂，而古老的传承也因此有了更辽阔的心胸与更坚定的心跳。

生在“刻砖刘”世家
一心传承家族技艺

冯骥才先生曾出版《天津砖刻艺术：手稿珍藏本》，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书稿。上世纪60年代初，冯骥才骑车经过老城里的大街小巷，被老房子上的砖刻吸引。在他眼中，那些砖刻就是繁复华美的艺术品，但也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逐一拍下砖刻的照片，并将其所在的地点、在建筑上的位置、雕刻的题材内容记录下来。他还结识了家住西门里、身怀绝技的“刻砖刘”刘凤鸣，得知天津城中很多宅院的砖刻都出自他手，刻砖的一切讲究和诀窍也都在他心上。

清代中期匠人马顺清将依附于建筑的砖刻提升为一门艺术，凭着独创的“贴砖法”闯出了“花活马家”的名号。刘凤鸣是马顺清的外孙，他年纪轻轻便琢磨出“堆贴透雕法”，能在方寸青砖上雕琢出层峦叠嶂的立体山水与栩栩如生的鸟兽精灵。天津的石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大悲禅院等古建筑上，都有“刻砖刘”鼎盛时期的砖刻作品。时光流逝，当刻砖技艺传至刘凤鸣四子刘书儒手中时，古建凋零，砖窑空置，这门辉煌过的老手艺仿佛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刘挽云是刘凤鸣长子刘书霖的孙女，她自小在这样一个“藏着辉煌过往，却难寻未来的”家族里长大。“四爷爷刘书儒和我的爷爷刘书霖年纪相差很大，我和两位长辈都很亲近，每天都追着他们玩泥巴。”刘挽云回忆，那时候，她的小手总在不停地捏着，一会儿是摇头摆尾的小狗，一会儿是竖起耳朵的小猫，有时还会照着砖刻纹样，捏出简单的缠枝莲。四爷爷在旁边看着，偶尔放下手中的活计指点一句：“耳朵再往前挪一点儿、花瓣的弧度再圆些，才像真的。”

刘挽云对砖刻有热忱，也有天赋，但家里人总说：“女孩子把砖刻当成爱好就好，没必要真扎进这一行。这个活太苦了，责任也很重。”命运的转向，始自她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读书时，到北京一家知名的拍卖行实习。在那里，她结识了范迪安、霍春阳等顶尖艺术家：“那些书画大家们得知我的家世，都鼓励我回



刘挽云与她的砖刻作品

不满足于简单的形制 要把砖刻变为艺术品

那时刘挽云还在北京上学，每个周末都回天津学砖刻。“砖太重，不方便来回带，每天我心里都惦记着没刻完的纹样。”她说。几年过去，四爷爷的身体大不如前，刘挽云终于下了决心，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天津，她说：“也没想前途什么的，就是不能看着两百年的家族手艺断了，现在想来，可能这个决定救了‘刻砖刘’，起码在我这一代守住了。”

刘挽云的砖刻从不是机械地复刻。四爷爷教的是“刻砖刘”的独特技法，她则凭借开阔的眼界，大胆引入现代工具来革新工艺。“女性从事砖刻时指力、体力都是劣势，为此我一直在寻找更趁手的工具。四爷爷只用过角磨机，觉得那已经是最好用的工具了。我尝试使用做玉雕、木雕的各种电动工具，后来发现牙医的气动工具比电动的更稳定，更适合雕刻易断易碎的青砖。”不满足于只是引入雕刻工具，她还主导开发了气电混动集成雕刻工作台，申请了专利。这种工作台能减少雕刻时的震动，让亭台楼阁的廊柱、栏杆等全镂空细节更精准，也解决了雕刻中粉尘污染的问题。对工匠来说，有新型工具的加持，能节省不少体力，大大缩短工期。当刘挽云把用新型工具雕刻出的作品摆在四爷爷面前时，老人感叹：“你比我做得好，真的好，这手艺在你手里活了！”

市场的不认可，是比技法更难逾越的难关。刘挽云坦言，头三年，自己没卖出去一块砖。她再次南下，到安徽与当地人合办砖刻厂，承接古建门楼工程，虽然能带来不错的收入，但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却不能满足她对砖刻艺术的追求。“砖刻厂的经历让我更明白了自己该走的路，我不想一味地重复一种形制或风格，我要做的是艺术品，想让每一件作品都有思想。”工厂平稳运行后，她返回天津，继续追寻自己的砖刻梦。

“技法是基础，最难的是设计和创意。”她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也依据米芾《研山铭》的画稿复刻出灵璧石笔山，砖面上山峦起伏、洞穴通透，石纹的肌理清晰可见。她把作品发到朋友圈，没想到，两位搞绘画的老师立刻找上门，愿意高价收藏。“从那以后我想通了，砖刻艺术就是小众，不用追求大众市场，只要找到懂它的人，就可以了。”她把目标客户锁定在热爱传统文化的藏家群体，跟懂的人聊，不用解释为什么一块普普通通的青砖在雕刻之后价值能涨千倍，好的作品可以让懂它的人一见钟情，这就是知音。

一次喝茶时的偶然发现，为刘挽云打开了砖刻生活化的新赛道。那天她随手把茶壶放在工作台的青砖上，几天后发现，砖面没有一点茶渍，甚至连茶味都没留下。青砖的吸水性和自洁性，让它天然具备了作为茶盘的优势。她刻了一块茶盘，半年后，砖面因吸收茶汤而泛出温润的光泽，像养了多年的茶宠。她开始尝试制作茶盘、壶承、笔山等日用器具。尤其是她为一些紫砂壶藏家定制的壶承，每一块都

根据壶的造型、藏家的喜好设计纹样。这些作品很快在藏家圈传开，不少人愿意出高价，再排一两年的队，就为了得到一块专门定制的手工砖刻茶盘。刘挽云感慨：“最普通的青砖，雕刻后比玉还贵，这就是手艺人价值吧。”

既是“守艺人” 也是革新者

刘挽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守艺人”，而更像一位追赶时尚的革新者。她深知传统师徒一对一的传承一旦中断，手艺可能就没了，因此她跳出家族局限，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产教融合”之路。

她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院校合作，把青砖与刻刀搬进了课堂。不同于传统师徒的口传心授，她针对学生的特点，开发出集成化的“教学包”。其中不仅包含适配教学场景的砖刻工作台、定制青砖材料包与专用工具包，还配套了详细的课程教案与教学视频。这些教学包实用性很强，即便没有砖刻基础的老师，也能对照视频指导学生完成从备料、画稿到基础雕刻的全流程操作。她还推动“刻砖刘”工作室成为高职院校的实践教育基地，让学生参与砖刻项目，在实践中提升技艺，打通了“教学、实践、就业”的传承链条。

“我在南方开工厂多年，深知市场缺什么样的人才，会手工雕刻、会电脑制图、会数控雕刻的全才，在雕刻行业‘一将难求’，所以我们的教学就对准了行业需求；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也能发现好苗子，重点培养。大家都认为非遗传承是家族秘传，其实有规模的、系统性的教学能更好地传承非遗。”刘挽云说。

谈及当下的非遗传承生态，刘挽云也有自己的想法：“非遗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些技艺是因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需求产生的，当代人可能不常用了。传承人首先要做的是守护技艺、精进手艺，其后才是怎样应用。把工艺做到位，再加上用心的创意，得到大家的认可，市场可能慢慢就来了，否则手艺迟早会变味儿。”

这些年刘挽云忙着做两件事：一件是给“刻砖刘”的老作品建数据库，从天津博物馆馆藏的《龙凤呈祥》

《四爱图》，到天津清真大寺、老城里徐家大院的砖刻遗存，她带着相机和扫描仪跑遍各处，记录下纹样细节、雕刻技法；另一件，是撰写《天津砖刻》专著，她想把“刻砖刘”的传承谱系、“堆贴透雕法”的核心步骤、天津砖刻南北兼容的风格成因，都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她说：“以前这些东西都装在四爷爷的脑子里，传给了我，万一哪天忘了怎么办？写成书，就能留得更久。”她还有更大的梦想，“先把天津的砖刻研究透，写清楚，有机会再把全国的砖刻历史与技法研究一遍，这事现在还没人做，我要是能做完，这辈子就没遗憾了。”

刘挽云用坚韧守住了传统，用智慧浇灌出新芽。就像她刻在砖上的那些纹样，既有祖辈留下的感觉，又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这，或许就是传承最好的状态。

刘挽云
本名刘季琰，天津民间工艺“刻砖刘”第五代传承人，天津美术学院特聘研究生导师，砖刻艺术化、生活化的开创者。代表作品有“洞见”太湖石系列、“解放桥”等。

刘挽云访谈
一代代人不断革新
才形成了好的传统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把传承这件事做好？

刘挽云：最初我四爷爷反对我学砖刻，是认为这门手艺没用了，看不到前景。我找青砖，展示南方的砖刻产业，不是为了证明它能挣大钱，而是为了证明现代社会依然有人需要这门技艺。这是一种存在价值的证明，是给我四爷爷信心，也是给自己信心。非遗传承的前提，是传承人从内心认同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并找到它能与当代社会连接的那个点——可以是市场需求，也可以是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甚至是情感价值。我先证明了它“活着”，然后再去思考如何让它“活得好”。顺序不能乱，心态不能急。

记者：您如何看待传统技法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关系？

刘挽云：什么是传统？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具，它本身就是一代代人不断革新、积累的结果。当年天津城的老匠人马顺清发明了“贴砖法”，我四爷爷刘凤鸣发明了“堆贴透雕法”，这些在他们的时代，也是创新。工具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创意、实现工艺精度。我四爷爷说，“你比我做得好了”，他夸赞的不仅仅是我用了新工具，更是我在新工具的辅助下，实现了他们当年想实现却难以达到的极致效果，比如更精细的镂空、更稳定的刻画。这超越是对他们技艺的真正继承和发扬，是对传统最大的尊重。如果固守老工具而让手艺停滞不前，甚至因为难度太大，做得远不如前人，那才是对传统的辜负。

记者：您如何把握艺术追求与商业生存之间的平衡？

刘挽云：我的平衡之道很清晰，就是“以商养艺，分层对待”。我把业务分得很开：一部分是商业板块，比如工厂承接的古建工程，要符合市场规律，要考虑成本、效率、客户需求，它是我和我的团队生存的基础；另一部分是艺术创作板块，这是纯粹的个人表达，可能耗时数月，不考虑市场接受，只追求艺术上的极致，我不求靠它挣钱，它更像是我的学术研究和个人修行。幸运的是，当商业板块做得扎实、艺术板块的成果逐渐被藏家认可后，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商业收入支撑艺术探索，艺术上的突破反过来又能提升整个品牌的价值和商业项目的品位。关键是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牺牲手艺的根和魂。

记者：您对自己的定位，是艺术家还是手艺人？

刘挽云：我从不敢自称艺术家，只能做一个“艺术化的工匠”，以传统技法进行艺术表达。既好看又有艺术思想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商业是让这个好作品能被更多的人看见，让手艺得以延续的手段。如果一心只想挣钱，手就会抖，眼就会花，做出的东西必然匠气、俗气，最终连商业价值也会失去。

(图片由刘挽云提供)

讲述

天津首部援青题材电影《小乔的夏天》杀青

在高原绽放温暖世界的笑容

口述 章元 采写 张洁

援青题材院线电影《小乔的夏天》于9月15日在西宁市举行杀青暨项目发布仪式。这是天津首部援青题材电影，也是黄南藏族自治州历史上首部院线电影。该片以天津援青教师为原型，通过援青教师小乔与藏族女孩羊毛加的故事，展现出援青人“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的坚守。编剧章元讲述了创作背后的故事，并表示：“目前电影已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将于明年与观众见面。”

前期一次次踏上高原
采访援青干部与藏民

电影《小乔的夏天》的出品人、监制、制片人、导演，包括我，我们都是天津人，深爱着家乡。对于创作者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像高密之于莫言那样的文学原乡。天津，就是我魂牵梦萦、要用一生去书写的那片土地。我用小说写过它，用舞台剧演过它，用纪录片记录过它，却唯独没有把它搬上过大银幕。我心中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写一封特别的“情书”给天津，我的故乡。

直到我偶然遇到那群眼里有光的援青人，听他们讲述在青海的故事时，才豁然开朗，知道这封“情书”该

怎么写了——真正的爱，不必去描绘。它有多炽热深沉，不必堆砌华丽的辞藻去赞美，不必刻意宣扬其中的付出与牺牲，更不必预先给它设定一个完美的模样。真正的爱，是它能给你义无反顾的力量。就像那穿越了1800公里距离的奔赴，那跨越了3800米海拔的投身，那超越了5479个日夜里，每一份荣光与每一次深情的回望。

为了这份“书写”，我进行了漫长而扎实的准备。前期采访花了两年时间，我记不清在天津和青海黄南之间往返了多少次，采访了上百位援青干部，走进了近百个藏族家庭。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一是提前了解藏区的风俗习惯，以示尊重；二就是想着怎么抵抗高原反应了。不过说实话，后面这项准备基本没用。

在那片高原上，让我记忆深刻的事太多了。既有地域差异带来的冲击，也有在深入了解后与当地同胞结下的深深情谊。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牧场深处迷路，导航失灵，手机也没了信号，放眼望去，只有一模一样、无边无际的草场。我们想到一个笨办法：找牛群。有牛群的地方，就一定有人！我们真的找到了牛群，守着它们，等待主人出现。最后，一位好心的藏族大哥把我们领到了大路上。

在那边，由于山体特殊，下点小雨就可能引发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我们在采访中，包括后来拍摄期间，都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很



《小乔的夏天》剧照

在身后的镇子，不过是这无际牧场上一个个微小的水泥注脚。散落在牧场上的牦牛，像凑成的一串串省略号。近处是青绿的草，远处是染了黛色的山，更远的，是那片蓝得不像话的天。身处其中，感到人是如此渺小，情不自禁地对这片天地涌起敬畏之心。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剧本，希望观众能通过镜头，沉浸式体验到黄南独特的风光。

还有一次更惊险的，我们夜晚行车时，与一头狼同行。一头跟“二哈”差不多大的白狼跟着我们的车跑。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只狗，直到它仰起头嗥叫，才确定是狼，赶紧油门踩到底，逃离现场。

在那边，由于山体特殊，下点小雨就可能引发泥石流，导致道路中断。我们在采访中，包括后来拍摄期间，都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从很

多援青干部那里得知，他们曾在这泥石流中九死一生，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也有援青人在泥石流中救下了藏民，从此成为一生的朋友。这些都被我如实记录在电影里。

我们每个人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我几次上去，高原反应一次比一次厉害，根本不存在什么“适应”一说。缺氧、头疼、失眠是家常便饭，我比较特殊的是剧烈呕吐，喝水都吐，最后还患上了胃炎。

夏天还是有的——寒原吹炽。当地全年供暖时间长达九个月，水温即使在夏天也时常只有0℃，昼夜温差非常大，人在白天可能被晒得中暑，夜间却要穿羽绒服。这与我们认识的夏天差别很大。但就是在这么寒冷的夏天，小乔带来了炽热。

电影故事围绕援青教师乔小桥偶然走进了高中女生羊毛加支离破碎的生活，在一次次被拒绝、被误解后，小桥依然艰难、笨拙地去靠近、去温暖、去照亮，最终收获了纯洁的友谊和坚定的信任。

对我来说，将天津援青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转化为银幕上的故事，关键在于回归到“人”本身。伟大的叙事，必须扎根于质朴的土壤，时代洪流正是由无数小人物的情感波涛汇聚而成。所以在创作时，我告诉自己，只需聆听、真看、真感受，把自己彻底敲碎，融进那片土地。

这种体会，完全倾注在女主角小乔的塑造上。我无意把她写成一位“全能的女战士”，她就像我们身边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也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她唯一的不同，或许在于基因里流淌着天津人独有的乐观与热情，内心充满阳光与力量——她的背后是天津给她的底气。而我心中最理想的画面，就是她能拥有可以温暖全世界的笑容。

电影里必然涉及天津与青海两地文化的碰撞，如何展现这种碰撞？我想用剧中乔小乔的母亲、老援青工作者王瑾的台词来回答：“别摆老师的架子，也别以为城市人就怎么着了，你在牧区没优势！好好相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不单是剧中人的信念，也是我从无数援青人身上看到的、最珍贵的态度——心存敬畏，平等相待。

天津对口支援黄南十五年，通过一批又一批援青人的共同奋斗，一次次真诚地走近、走进，早已不再有“我们”和“他们”，全都是“咱们”。

凸显现实生活的内核 严肃题材兼具可看性

我在文学与影视领域深耕近二十年，自2003年发表处女作以来，已出版《空窗》《给我一把椅子》等九部长篇小说。我的笔触并未止于纸面，更延伸至舞台与银幕，担任编剧及制作人，创作了《阿门，洋葱》《爱在零纬度》等十余部戏剧影视作品。

在真实与戏剧的天平上，我坚持所有戏剧都要以现实生活的真实为内核。我们要做的，是用强矛盾、强节奏的电影语法，凸显出现在中那些不易察觉的本质真实。至于如何让严肃题材兼具可看性，我总结出“反套路”三原则：敬畏创作是初心、尊重观众是底线、

保持前瞻性是关键。说到底，见自己、见天地，最终才能见众生。

《小乔的夏天》中的青海大地，从来不只是故事的背景板。那里的雪山、草原、稀薄空气，都是推动情节、雕刻人物的“隐性主角”。那片土地不仅划定了故事的物理边界，更渗透进每个角色的灵魂——说下雨就下雨的瞬息万变，让自然环境本身成为叙事动力，实现了地理环境“开口说话”。当然，拍摄中除了高原反应，最难的就是应对这任性的天气。而这样折磨人的高原反应，却是我们成千上万援青人必须面对的长期的日常。我听说，援青教师们从办公楼走到教学楼，短短一百多米的路，因为喘不上气，要走15分钟，爬楼梯更是一件“恐怖”的事；有的老师讲着讲着课，会突然晕倒；因为说话费劲，怕后排学生听不清，很多老师都戴着“小蜜蜂”上课……每当想到这些，我内心都充满无法言说的敬意。他们，是真正正在用生命温暖生命，用奉编写大爱的一群人。

从天津到青海，在我的创作中始终贯穿一个母题：希望与力量。这无关地域转换，而是人性深处共通的微光。很多人问起“天津首部援青电影”这个标签带来的压力，其实创作时我很纯粹，从没多想。文艺作品天然承载着社会意义，它是时代脉搏的回响，我们只需真诚创作，然后交给观众检验。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分子，都会关注时代命题。就我而言，从以跨国爱情为切入点的“一带一路”题材的《爱在零纬度》，到以马拉松运动为切入点的脱贫攻坚题材的《奔跑吧紫溪》，再到这一部以两个女孩的友谊为切入点的援青主题电影，我只能说，我非常幸运、幸福——身为创作者，既可以参与、见证这美好的时代，还可以书写、记录时代。未来，我会继续书写天津故事，下一部将聚焦天津小洋楼，希望能带来不一样的解读。